

对联论

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

◎ 杨大方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对联论

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

杨大方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杨大方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660 - 0082 - 8

I. ①对… II. ①杨… III. ①对联—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1220 号

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

作 者 杨大方

责任编辑 舒 松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1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082 - 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我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我反复阅读次数最多的大概就是杨大方的这篇论文了。不能说这是论文中最好的一篇，而是它的内容太吸引我了。因为对联对仗工整，思想深刻，语句优美，例句中处处有闪光的火花，最完美地体现汉族人的思维特点。本书拿对联作为研究对象，有全面的材料，有系统的叙述，有新的视角，有新的观点，五年前的初稿就觉得难能可贵，现在作者又进行了修改加工，自然更引人入胜了。

在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研究对联，第一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把对联作为语言文化来研究；其次是用混沌学的方法研究对联现象，这在以往的对联研究中实属罕见。我们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对联作为语言的精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汉语、汉字为对联这种现象造就了先天的条件，这是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珍品。自然界存在着无数平衡对称的现象，对联最巧妙地体现了这种平衡对称现象。事物在平衡与平衡破缺中运转，事物在平衡破缺之后又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和谐与稳定，这是事物运转的规律，也是人们心理的追求，对联就是人们心理的这种满足。杨大方的著作从汉字汉语的环境出发，从对称的关系切入，回顾历史，追踪传播地域，考察分布范围，揭示对联的性质和特点，从多个角度加深了人们对对联的认识。

我们认为文化是各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成果的总和，杨大方抓住了对联的文化性质，指出对联是适应汉字汉语和对偶观念这两个环境的结果。没有汉字汉语和汉族人长期形成的对偶

观念这样的环境，就不可能产生对联这种现象。这是从对联的产生和生存条件来说的。对于这样的环境产品来说，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越出对这种语言现象的结构分析，而看到对联的表达功能。杨大方把对称表达、简短表达和诗性表达看作对联的突出特点，事实上也就突出了对联的文化性质。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作者就能纵横捭阖，自由驰骋，得以步步深入了。

由于有了文化语言学的视角，作者看到对联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或者文字游戏，而是一种由对偶修辞发展而来的言语模式。这种模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还体现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语言气质。语言的文化气质是对语言进行整体观察的一个收获，是混沌学应用于语言文化研究的一个成果。整体观是混沌学观察事物的基点之一，混沌学帮助我们发现事物许多原来看不到的性质。

将混沌学应用于人文科学并不是机械地把混沌学的模型构建，数值计算和实验观察以及 KAM 定理、Logistic 方程等原封不动地搬到我们的文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或者语言学研究中来，而主要是把混沌学的基本原理有效地应用于具体人文科学的研究。例如，混沌学重视顿悟，重视整体观察，这对人文科学的研究就十分有用；混沌学原理中的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以及分叉，分形，奇异吸引子，非线性，自相似性，平衡与平衡破缺等等，还有人们常说的“蝴蝶效应”，都是人文现象中的常态，人文科学完全可以应用这些原理分析各种人文现象。杨大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对联与文化整体的自相似性，阐述简短表达中对顿悟的重视，分析对联的对称与平衡，研究文化传播中的奇异吸引子，这是一种新的思路，其结果是对对联提供了许多新的认识。一般的可以说，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的更新又加深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这是一般的科学规律，它也体现在杨大方对对联的研究之中。这里可以引用书中所引的故宫里的一副对联：“转谛在语言而外，悟机得真实之中”，这副对联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由于方法论的转变，在对联的具体材料中，

悟得了新的认识。真是切中要害！

杨大方的书是将浑沌学应用于语言文化研究的又一新的成果，我看他这几年的努力是成功的。为此写了上面这些话，以与作者共勉。

张公瑾

2011 年 10 月 22 日

目 录

导 论	(1)
一、论题缘起及基本思路	(1)
二、研究价值	(9)
第一章 对联：一种表现为言语模式的语言文化	(17)
第一节 对联概说	(17)
一、对联名与实	(17)
二、对联发展简史	(19)
三、对联盛行的原因	(26)
四、对联的功能	(31)
五、对联的分类	(51)
第二节 对联的性质	(53)
一、前人观点述评	(53)
二、对联是一种言语行为模式的语言文化	(65)
第二章 对联：文化——适应环境的一个成果	(68)
第一节 对联是适应汉字汉语环境的一个成果	(68)
一、汉字环境	(69)
二、汉语环境	(73)
第二节 对联是适应对称观念的一个成果	(77)
一、中国的对偶观念	(78)
二、科学中的对称观念	(80)

第三章 对联：语言对称表达文化的一个标本	(84)
第一节 汉语对称表达的一般表现	(85)
一、静态考察	(85)
二、动态考察	(88)
三、历时的表现	(92)
第二节 语言对称表达文化的发展阶段	(100)
一、在诗文中（或一般言语中）追求字数相等、句式相同的表达	(101)
二、把诗文中句式相同、字数相等的句子拿出来，单独使用	(102)
三、完整、独立地使用对联形式，并讲究技巧	(103)
四、春联等对联形式出现	(103)
五、各种实用对联广泛运用	(103)
第三节 对联是语言对称表达文化的一个标本	(104)
一、形的方面	(106)
二、音的方面	(106)
三、义的方面	(107)
四、语法方面	(109)
五、修辞方面	(110)
第四章 对联：简短表达文化的一个范式	(114)
第一节 简短表达的基础	(114)
第二节 简短表达的表现	(117)
一、诗文的简短传统	(117)
二、其他话语形式的简短传统	(122)
第三节 简短为对联另一重要特征	(122)
一、简短是对联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123)
二、对联简短的方法	(126)
三、关于“长联”及相关问题	(127)

第五章 对联：诗性表达文化的一个例证	(129)
第一节 诗性表达文化	(129)
一、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生活	(129)
二、直抒胸臆，带有浓郁的情感色彩	(131)
三、强调整节奏感，形式整齐和谐	(132)
四、强调形象性	(132)
五、重视意境营造	(133)
第二节 对联诗性表达特点之体现	(134)
一、形式整齐对仗	(134)
二、语言上讲究音韵和谐、抑扬顿挫	(136)
三、表达上强调形象性	(138)
四、具有诗歌洗练的风格	(144)
五、具有诗歌般深邃的意境	(145)
六、具有实用性	(145)
第六章 对联：广义民俗文化的一个事象	(147)
第一节 春联和春节	(148)
一、春联源于春节“钉桃符”习俗	(148)
二、春联的盛行	(150)
三、春联的特点	(151)
第二节 巧对和文字游戏	(153)
一、巧对是一种古老的文字游戏民俗	(153)
二、常见巧对	(154)
第三节 题赠联和题赠习俗	(164)
第七章 对联：地域文化的一个侧面	(166)
第一节 明清两代对联名家的地区分布情况	(166)
第二节 名胜楹联的地区分布情况	(168)
第三节 和地域文化相关的其他对联情况	(170)
一、长联作品较多的地区	(171)

二、好为巧绝游戏联的地区.....	(186)
三、有关材料关于一些地区对联的记载.....	(188)
第八章 对联：汉文化圈中的一个奇异吸引子.....	(192)
第一节 对联在宗教文化中的传播.....	(193)
一、对联在佛教中广泛使用.....	(193)
二、伊斯兰教、基督教使用对联的情况.....	(205)
第二节 对联在海外的传播.....	(208)
一、汉字文化圈中对联使用情况.....	(209)
二、汉语文化圈中对联的使用情况.....	(217)
三、一般汉文化圈中对联的使用情况.....	(219)
第三节 境内兄弟民族对联使用情况.....	(220)
第九章 余 论.....	(224)
主要参考文献.....	(229)
附 录.....	(239)
一、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及范文澜之题注	(239)
二、古人所概括的诗文对仗之法举要.....	(240)
三、今人朱承平所概括的中国古典诗文对仗之法.....	(241)
四、《中国儿童阅读文库》丛书《韵语篇》内容 简介.....	(242)
五、《联话丛编》对联摘录	(244)
后 记.....	(324)

导 论

一、论题缘起及基本思路

(一) 对文化的关注：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直接动因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学说。这一学说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尽管索绪尔首先发现了“言语”，但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却对“言语”弃之不顾。言语成了索绪尔的“弃婴”。有意思的是，事实因发现而存在，存在的事实无法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言语”这一概念的提出，为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乔姆斯基把“言语”发展为“语言运用”（和“语言能力”相对）后，人们似乎突然明白，没有“语言运用”（即“言语”），也就没有“语言”。于是，言语规律的研究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言语由“弃婴”变成了“宠儿”，不再被排斥在语言研究之外。与此同时，随着“语言运用”研究的日益深入，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环境因素，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因而研究语言和社会、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便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文化语言学在中国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兴起了一场“文化热”。这场“文化热”，被誉为一次“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问题的讨论中，出现过两种互相对立的偏向，一是传统主义；一是反传统主义。反传统主义崇尚着全盘

西化，而传统主义则固守儒学的传统。”^① 两种偏向代表两种观点并激烈碰撞。反传统主义认为外族文化优越；传统主义则认为本族文化优越。碰撞的结果是更多的人认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其实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而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而言，却都是别无选择的结果。而且，由于环境的多元格局，必然导致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文化相对论产生的现实基础。在文化碰撞和冲突中，汉文化其实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有着非常一样的经历，作为一种文化的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样，都曾经历过备受责难的境况。曾几何时，对汉语言的批评和指责不绝于耳，说它是一种繁难的、模糊的、散漫的、主客体不分的、时态少变化的、概念不清晰的、逻辑欠周密的语言，说它是“非科学模式”的语言，说它是一种阻滞中国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的语言，因此要“彻底改造汉语言”乃至“废除汉语言”。^② 尤其是汉字，几十年的拼音化运动和取消汉字的呼声几乎将其推到了消失的边缘，但它居然挺过来了，而且还经受住了信息时代的考验。这样，就促使人们对汉字汉语进行重新审视，考察其和汉文化的内在联系，研究其生命力的源泉。于是文化语言学在中国潮涌而起。民族语的文化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蓬勃地发展起来。“现在大家已逐步认识到，民族文化中最鲜明的标志是语言，民族文化的盛衰与本族语言的存亡是直接相关的。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是民族独立和发展的标志。在这种社会思潮推动下，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语言，把语言看成是主要的文化现象，就成了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催生剂……文化语言学只能产生在东方、产生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

^① 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255—257页。

^② 鲁枢元：《超越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何九盈等：《简论汉字文化学》，载邵敬敏主编、史有为审订《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1995年。

国家。”^①

（二）语言是一种文化：现代文化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人类创造最原始工具的同时，还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东西——语言符号。语言符号被创造出来之后，“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② 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不仅是人们用来交际的重要工具和记录传承其他文化信息的载体，而且也是反映民族精神、民族思维方式和对世界进行认识的一种“全息块”^③，是一种特殊文化。各种文化共同体的特色，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民族语言上。在语言的交往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不同文化形态的区别，也能明显感受到文化传统对个人的制约作用。人创造了语言，语言也创造了人。另一方面，语言跟文化整体有一种自相似性。语言与文化同构，语言是凝缩了的文化。由于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具有自相似性，研究中就有系统平衡原则，这样就有可能从语言方面来研究文化。但它不是表现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④ 语言的结构性、语言的制度性、语言的集体性、语言一代一代的传递性、语言在传递时候的强制性，都是人类文化整体特征的特殊体现。语言既是文化整体结构特点的一个记录、一个对应、一个外显、一个内存，同时，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语言深藏的结构中，我们可以找到文化整体的深藏结构。

文化语言学虽然有各种流派，但在对语言的文化本质的认识方面，却有着基本一致的观点，都认为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历史上各种因素积累起来的综合体系。语言是在社会共

①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11页。

② [德]恩斯特·卡西勒著，甘阳译：《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37页。

③ 莫彭龄：《汉语成语新论》，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④ 张公瑾：“语言文化研究方法论”（博士生课程）课堂笔记，2001年。

同理解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共同现象：作为文化代码是一种符号系统；跟其他文化现象平行发展，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语言是文化现象，并不是想否认语言的符号性质，只不过我们认为，语言符号不仅仅是巴甫洛夫所称的第一信号系统中的那种纯粹导致生理上的条件反射的信号，它还储存着人类的种族记忆、历史知识，“凝聚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感受”，而“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的积累，就是文化。”^①因此，语言符号“不仅是意义的代码，而且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符号系统，也是“文化系统”。^②同时，我们也承认语言的工具性，但应该看到，语言的工具作用只是它作用的一个方面，它还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凝聚体。我们说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完全先天的，正相反，虽然语言有一定的生理、物理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的本能。从根本上讲，语言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遗传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是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形成和不断完善的，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具有文化最基本的特性：习得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具有句子的再生能力，并不是什么人脑的先天机制在起作用，而是人们在语言学习中所得到的对语言的认识在起作用，这里面有模仿、类推的过程，而模仿、类推显然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语言不是无机物，语言是生物之一的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③把语言仅仅看成是交际工具、符号系统，都有其局限性。因为交际工具、符号系统虽然也是人的一种创造物，但这种创造物，似乎是可以评判优劣的，是可以统一的。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世界并不仅仅只有西方；普天下适用的科学因素也并不仅仅存在于西方。曾经超越西方的东方文明几千年来成为地域文化发达的源泉，

①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②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③ 史有为：《汉语如是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

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意味着该种文明或文化有值得吸收、继承的合理养分。”^①

“文化是各个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② 语言作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之一和适应成果之一，也是一种文化，这本来是应该没有疑义的。但是对于语言的研究来说，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或是把语言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或是把语言就当作语言现象来研究。虽然通过语言来研究社会与文化，在中外学术界都有悠久的传统，但与经典的传统语言学相比，这种研究始终没有达到学科性的规模。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期以来，人们的语言观念在实质上并未“文化”化。科学语言学产生以后，对于语言的界定主要有以下观点：1. 语言是一种机械现象；2. 语言是一种有机体；3. 语言是一种有“自在的特殊结构”的符号体系；4. 语言是人脑的一种先天机制；5. 语言是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这些观点都只看到了语言物理、生理的一面，而忽略了语言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因此是片面的。如前所述，这种现象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改观。此时兴起的中国文化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促使人们对语言本质进行重新审视。

（三）言语模式：一种语言文化

“语言文化”这一术语是史有为先生首先提出来的，用以指称语言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说：“我们可以将语言视作一种特殊的文化，是与人类创造自身一起创造出来的文化，是从动物本能演变为创造活动时刻的首批文化。这种特殊文化可以称作‘元文化’。

^① 史有为：《汉语如是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97 页。

^②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3 页。张先生的文化定义不仅简练概括，具有普适性和涵盖性，内涵比一般文化定义的内涵更本质、更具体，而且突出了环境因素，强调了环境价值理念，符合现代环境伦理学新理论——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多样性和共生原则，因此本书采用之。

元文化有数种，而语言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可以称之为‘语言文化’”。^① 史有为先生之所以这样来定义语言，是因为他试图在揭示语言的文化本质的同时，将语言这种文化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加以区分。他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此将它称作‘语言文化’，以与一般文化相区别。在语言文化中，又可以有显性与隐性之别，显性文化是词汇和语言运用，隐性文化是语音和语法。”^② 他还认为：“语言就选择论而非决定论的意义上说，在一定时期与一定程度上对其他文化有某种解释力，因而也是一种元文化。元文化是人类最初脱离野兽状态时首批创造的文化。至少有四种是具有元文化性质的，即语言、音乐、对人体和两性关系的观念、对天人关系的观念。它们是与人共生的，是与人类创造自身一起创造的文化。”^③ 陈保亚也有类似的提法，并著成《语言文化论》一书探讨了相关问题。^④ 将语言看做是文化现象，并将其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与将语言称作“语言文化”以区别于其他文化，本无本质上的不同，但“语言文化”这个术语更加突出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的独立性，表征了与其他文化现象的本质差异，同时也便于从研究角度对语言这种文化系统的子系统进行再划分。因此，“‘语言文化’的提法更贴近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规范或习惯，也符合‘特定环境适应说’的文化定义。”^⑤

语言是由运用而创造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讲，文化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人类的一种创造物——一种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

① 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② 宋永培、端木黎明：《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5页。

③ 宋永培、端木黎明：《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④ 陈保亚：《语言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⑤ 丁石庆：《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0—11页。

言语的形式。也就是说，言语从一开始就是文化的。既然言语是文化，那么言语模式也就是文化。既然言语是语言的一部分，言语模式这种文化也就是一种语言文化。通过对一种语言言语模式的考察和研究，可以了解和发现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文化的某些特点，并藉此探讨民族文化特点与言语表达模式之间的关系。

（四）浑沌学理论：文化语言学研究中的新方法

任何学科的创立和完善，都不仅需要产生的条件和理论的源泉，而且也需要方法论的支撑，文化语言学也不例外。事实上，正是因为不同流派的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者在这方面的持续努力，才使文化语言学得以在中国蓬勃发展。这其中，张公瑾先生是比较突出而且特色鲜明的一位。他认为，语言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对另一个流派的否定，实际上都是转换思维框架后产生的一场语言学革命，同样，今后语言学的发展，如果要想有新的根本的突破，也必须实现思维框架的转换。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自己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和研究实践中，引入非线性科学中浑沌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对现有思维框架的转换和突破。通过转换，张先生试图使文化语言学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科学，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语言学科。我们认为，张先生所介引的浑沌学理论与方法中，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一，整体观。很多事物只有从远处才能看得清楚，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因为离观察的事物太近，或是身居所考察事物之中，而被视点、视角所局限。因此，我们研究认识事物，就要想方设法避免孤立地去看问题，而应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过去那种以局部之和代替整体的观念和做法，在浑沌学看来是不正确的。浑沌学理论认为，整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和。从整体入手对语言文化进行把握，与把语言分成几大要素分别进行孤立的考察之间，显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直觉性的、连续性的，是一种直指事物性质的认知方式，后者则是分析性